

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

姚邦藻 殷寄明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

姚邦藻 殷寄明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姚邦藻, 殷寄明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3

ISBN 7-5075-1337-8

. 徽... . 姚... 殷... . 语言学家-评传
安徽省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75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传真:(010)83086663 电话:(010)66035914

网 址:[http: www.hwcbs.com](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 hwcbs.com](mailto:webmaster@h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65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前言

目前徽学研究热正在国内和东南亚兴起，西方学者也在“目语心计”了，可知徽学研究者几乎遍及全球。

徽学是什么？徽学就是徽州学，就是把徽州的历史区域文化及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徽州文化的学问。最近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黄山市，曾给予徽州文化极高的评价，誉之博大精深，为我们阐明了徽州文化的研究价值。

打开徽州文化史，徽州文化的诸多方面，总是和徽州历代语言学家的成就和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徽州(今称黄山市)这块地方(老徽州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旧称“徽州六邑”)，是历代语言学家辈出的地方，因此编写一部《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不仅是学术界的需要，也是教育界的需要。

1999 年底，在本书姚邦藻主编的策划和组织下，开始了调研和编写工作。历经一年多的时间，今天终于跟大家见面。当然，这部书不可能把徽州历代语言学家全部列入，不过重要人物基本上已经收入了。为了弥补不足，后附《徽州历代学者语文著述简况》，暂供大家参检之用。本项研编工作仍在分阶段进行，有望今后见到续集。

全书在初稿完成的基础上，由姚邦藻主编负责全面审订和统稿定稿。复旦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殷寄明先生(本书主编之一)也参与了本书的审订工作。汪大白、吴伟逸、毕民智、汪起男、方利山、金家恒、程家源、任朝霞等八人先后分别承担了本书的编务工作。由于稿件涉及历代，加之编写时间短促，书中难免有欠妥之处，敬希学术界、教育界的行家、读者多多赐教。

最后向曾经支持、关心本书调研、编写、出版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山高专《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编写组

目录

前言	5
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要	8
罗愿	26
朱熹	39
黄生	62
江永	103
江声	148
戴震	162
程瑶田	191
江有诰	203
俞正燮	216
胡适	248
胡裕树	279
胡竹安	335
[附录] 徽州历代学者语文著述简况	361
跋	417

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要

姚邦藻

一、界说与题旨

语言学(linguistics)是把语言(language)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领域,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一般地说主要包括语音学(Phonetics)、词汇学(lexicology)和语法学(Grammar)三大分支。这些基本认识,大家几乎是一致的。说到中国的古代语言学,按照传统认识,一般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三大分支,旧称“小学”。至于语法学,主要放在训诂方面,直到马建忠才有系统语法研究工作。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古代语言学家不讲语法现象,只是有些训诂学家注重词义解释,没把语法现象疏释明白。然而,白兆麟先生讲得好,像戴震这样的古代语言学家是“心知原句文法”的。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在《孟子字义疏证·序》中就“解释最精当”(1)。

中国是世界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另有印度和希腊。也有人认为阿拉伯也是世界语言研究的发源地之一(2)。这里不打算争论这个问题。本文开篇廓清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界说(3)，只是为了题旨的需要，以便展开评说徽州历代语言学家。

二、成就与特点

打开中国语言学史，徽州历代语言学家映入人们眼帘的首先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是江永和戴震。

江永是清代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人。他精于音理，擅长审音，以“等韵图”为开启中古韵书的钥匙，揭示了《广韵》全部的音系。在《四声切韵表》中除四声、阴阳、开合外，他还把区别洪细音的奥妙点破了出来，直到今天基本上仍有可取之处。因此，江永可谓审音派的先驱。他著《音学辨微》，巧抓要领，用“必舌头击腭”、“令舌上抵腭”、“两唇相搏”、“音穿唇缝”等形象语言把字母的各类不同发音方法深入浅出地勾画了出来。尤其可贵的是重视认清研究对象以及材料的性质，而后确定古韵的依据，著《古韵标准》。

戴震，是清代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是江永的拜门高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仅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同时还是杰出的考据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答段若膺论韵》一文中，他指出：“仆谓审音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这一经典论述，曾被后人称作“审音派的宣言。”⁽⁴⁾可见，审音派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尤长于音变研究，后人又称他为通变派。他注意到《广韵》中谐声字的变化，比古今韵部的字变化大，因此搞音变，倡阴阳相配，阴阳相转，异平同入(当然实际上也有异入同平)，又立正转、旁转、互转、逆转⁽⁵⁾。他的古韵分部，首次揭示了上古韵类系统的结构特点，创立了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原则，王力的以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先秦古韵二十九部(战国时代为三十部)，实际上就是戴震以阴阳入三声配的二十五部的继承和发展⁽⁶⁾。他的《声类表》(实际上就是转语)，归纳出声母变转的规律，正是用为训释转注。他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作序，明确提出了“故训音声，相为

表里”的看法，指出：“六书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其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就是主张在假借上采用“因声求义”，在训诂法上突破了许慎《说文解字》以来“因形求义”的旧框框(7)。他的另一力作《方言疏证》，在精细校勘的基础上，运用了音义贯通的原则。在文字方面，他的“四体二用”说，今天看来仍有合理之处。他主张“学者当不以人弊己，不以己自弊”，故得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著述丰厚，并开了一代追求真实的新风，成了皖派朴学的领袖，无愧为一代宗师。《光明日报》“新千年开篇珍藏版”把戴震列为“祖国千年科学文化人物”之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程瑶田，他是清代徽州府歙县(今属黄山市)人。据说戴震的拜师活动，就是受到他的启发。他一生主要以著述为事，不蔽于简策陈言，不鄙弃方俗遗语，博考文献，且辅之以目验。浩浩四十二卷的《通艺录》，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在《螟蛉蛄羸异闻记》中认为：“陈言相同，不如目验。物类感化，诚亦有然。”他目验“螟蛉”长达三年之久，功夫令人感佩。这跟以前那些只是竞尚清淡的经生

博士大不一样。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代表了清代考证正名核实之学的特点(8)。《尔雅·释言》文字简古，他求诸文字声韵之原，并采用今语解释古语。考定“栋”、“梁”二字本义，深入调研，终于辨明了“栋”则极之横材，“梁”则柁之正材(9)。

《螺赢转语记》是他的另一部专著，旨趣在于推析双声叠韵同源连绵词的衍生，据说王念孙曾极力推崇此书，并为之列谱罗证而撰《叠韵转语》，可惜此举未竟。

江有浩在清儒中是后起之秀，徽州府歙县人。他不治举业，专攻音韵学，晚年又治《说文解字》。著有《音学十书》等，可惜后因家中失火，除《音学十书》尚存八种外，别的几乎焚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学成才，善于独立思考，不囿于成见。尽管深得段玉裁器重，又是后辈之人，但对段著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也是他能有成就的原因。在古音学方面，他主张“祭、叶、缉”三部独立，颇有创见，证据充足。虽与戴震有相同之处，但两人思考角度有别：戴震考虑的是声韵的系统性、相配性，而江有浩考虑的是韵部的独立性。《入声表》是他的古郁精品，

在解决入声分配方面贡献最大，对段玉裁的入声分配作了不小的更改，订正了段氏入声分配的失误之处以及在合韵问题上的不当之处。他将审音特长用于“考古”，所以能超出那些审音欠精的前辈。诚如段氏在《诗经韵谈·序》中所云：“晋三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家皆有匡补之功。”这显然是对江有诰造诣的有力肯定。

祖籍在清代徽州府休宁县的江声，生于当时苏州元和（今苏州市吴县），颇受吴派朴学影响。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其《尚书集注音疏》为尚书学的集大成者，其中多处颇有见地，如对《尚书泰誓》的考证。他的《六书说》注重六书的理论分析，阐述汉字的发展。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对“转注”的论述，认为只有具备形体和意义两个基本条件才算得上为转注字。他本人也颇为自信：“转注之说，古无定部，得此足以破其的。”在文字学方面，无疑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唐人徐锴的理论。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值得提及的是，他知识渊博，且注重实际，反对凿空为径的臆断，一生又不为流俗囿之，更不为利禄所诱，不事科举功名，惟好经义古学。

江沅是江声的孙子，师事段玉裁。先后著有《说文释例》和《说文解字音韵表》等，是研究“说文”学的重要文献。《说文释例》分“释字例”和“释音例”上下两卷。上卷“释字例”旨在释通《说文解字》的字本义。如“餐”，隶变作“扑”，指出“唐石经初刻不误，斲者乃改刻为从木，其误甚矣”，“《经典释文》从才，不误”，“毛诗‘八月剥枣’，《释文》‘剥，普卜反’，是谓剥为扑之借”。他在《说文解字注·后叙》中就提到：“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经史百家字多假借，许氏以说解名，不得不专言本义者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这条思路实际上与戴震是一脉相承的。说文学界把江沅的《说文释例》和王筠的《说文释例》、胡秉虔的《说文管见》等叫做释例派。他的《说文释例》下卷“释音例”，是就段玉裁谐声表发挥其旨趣，跟他的《说文解字音韵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字下先引大徐本的说解(偶用小徐本)而后写疏语，其实语言文字的观点贯串在此书中。关于六书的转注和假借，他认为数字一义为转注，一字数义为假借。同时他不同意段玉裁改动《说文解

字》的原文，认为：“相去千载不得面质只可阙疑，安得擅易？”

历来为学术界看成清代训诂学复兴先导之一的黄生，清代徽州府歙县人。章太炎称“唯小学，亦自黄氏发之”。（《太炎文录·说林下》）从当时来看，以声音求训诂，据说是发端于黄生。不幸的是，其所撰著作几乎全部奉诏毁于乾隆年代，仅《字诂》、《义府》二书由戴震访得，编入《四库全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诗·周颂》中“有客信信”，毛传“再宿为信”，黄生读“信”为申，认为“注家知训为‘再宿’，而不知读信为申”。这以‘申’为‘信’的本字，以声音求训诂，乃黄生首次提出，见于《字诂》。他在《义府》中还可曾批评“穿凿附会”。《书·武威》中“血流漂杵”，历来注家以讹传讹，而黄生依据文献例证，因声求义，训为“血流飘盾”，曾被学术界称之为“空前的创立”，可见其功力了。

学术界知道朱骏声是清代江苏元和人，但他自道光八年（公元 1828 年）改授徽州黟县，直到在咸丰八年（公元 1848 年）去世为止，这二十年间基本上侨住黟

县，而且他的主要著作又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故本文不能不把他列入。朱骏声著作多种，唯《说文通训定声》是他一生精力交瘁之作。此作在方法上摆脱《说文》，而又以《说文》为材，“舍形取声，贯穿联缀”，颇有创进，开拓了词义研究的新领域，是说文学的重要文献，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谐声字典。他在书的序言中说：“题曰说文，表所字也；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他“表所字”，却不囿于“宋”，实际上他已把字义的重点扩大到引申和假借，具有字形字义演变的历史发展观。同时，他还时而按字形偏旁纠正许慎之错处。然而此书最大的优点还在“通训”，“荟萃众说而得其精”，“且举转注之法，独创义例，根据确凿，实发前人所未发”（罗惇衍序）。又以精义古音相贯穿，辨明字之假借。故“通训”最有独到创进之处。“定声”是把字书和韵书合为一体的新体例，突出了以“以声求义”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与他治学上的古音韵学功力和具有的科学眼光是分不开的。朱著不愧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之作。

清代徽州语言学家辈出，区区一篇文章实难勾画全面。这里不妨把视线推前到南宋，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徽州在语言学(旧谓“小学”)这块园地上就已经有了出手不凡的耕耘者，如朱熹，又如罗愿。朱熹是南宋新安郡(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人，是古代社会影响颇大的哲学家，除孔子外似乎没有超过他的。他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个突出的训诂学家。他广注典籍，著作丰厚。他死后，朝廷采用他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训释，后世合称《四书集注》。他的门人还辑录有《朱子语录》，学术影响后世七百年。就训诂学的意义而言，当时南宋在训诂学风上有所变化，朱熹可谓独树一帜。他主张“文义名物之释，当求之训诂”，“解经先要依训诂说字”，特点是比较尊重前人的训诂。至于前人注释有诘屈难通之处，尚能从语言实际出发，长于说理，写出简明易懂的释语。这可以看做当时训诂学发展的踪迹。《光明日报》新千年开篇珍藏版也把朱熹列为“祖国千年科学文化人物”。

罗愿也是颇有名气的南宋学者。朱熹赞其“文有经纬”。在语言学方面著有《尔雅翼》，为《尔雅》